

记残宋本《刘梦得文集》

屈守元

宋刊本《刘梦得文集》，现在残存第一至第四，共四卷，藏北京图书馆。这是所知刘禹锡诗文集现存三个宋刻本中的一个。写完《谈刘禹锡诗文集的两个影宋本》一文（见本刊第三期）后，读到这个残宋本，用以与“董影”“徐影”诸本比较一过，初步了解它的一些基本情况。

残宋本每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。版式为白口，单鱼尾，左右边双线。鱼尾下标“得一”、“得二”等简文书称及其卷次。中缝无刻工姓名。卷一第一行标“刘梦得文集卷第一”，次行无刘禹锡衔名，与“董影”同（“徐影”有之）。书首无总目（“董影”有之）。每卷前有目，与“董影”、“徐影”略似。它的书名同于“董影”，而卷第次序则同于“徐影”，所存一至四卷，实为“董影”的第十一及第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等卷。第一卷书题下有“铁琴铜剑楼”及“绍基秘笈”白文印、“稽瑞楼”白文长印；第四卷末有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楷体朱文长印。

这个残宋本原经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（一七七三——一八二五年；黄丕烈号荃圃，他的名号很多，事迹具江标《黄荃圃先生年谱》）收藏过，见《百宋一廛赋注》及《百宋一廛书录》。后为陈揆（子准）所有，《稽瑞楼书目》中附在《刘宾客集》下的“残宋本”一册，当即此书。北京图书馆入藏以前，则在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，见《铁琴铜剑楼书目》（以下省称《瞿目》）卷十九。

据黄丕烈《孟浩然诗集》（宋本）、《孟东野诗集》（北宋本、宋刻本、校宋旧抄本、校本）、《姚少监诗集》（校宋本、旧抄本、残宋本、汲古阁抄本）诸书跋语（皆见《荃圃藏书题识》卷七；下引黄跋见于此书此卷者不复标注），得知关于这个残本的两方面情况：

第一，关于这个残本及其同一版式唐人诸集的收藏情况。这个残宋本《刘梦得文集》原藏苏州陆西屏家，丙辰（一七九六年）以前，与残宋本《刘文房集》同归于黄氏（校宋本《姚少监文集》跋）。后来（甲子，一八〇四年），陆西屏家所藏同一版式的《姚少监集》残宋本，又归于周锡瓚（香严）；周在壬申（一八一二年）五月举以赠黄（旧抄本及残宋本《姚少监文集》跋）。类此的唐人集子，黄丕烈还收藏有《孟浩然集》和《孟东野集》。全本《孟浩然集》是黄氏辛酉（一八〇一年）得于西山堂书铺的（宋本《孟浩然集》跋），残本《孟东野集》是他庚午（一八一〇年）得于无锡故家的（北宋本及宋刻本《孟东野文集》跋）。这些书都有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长印。黄

丕烈说：“类此版式唐人文集不下数十种。”他所见到的除上面诸种外，还有《韩昌黎集》（宋本《孟浩然集》跋）。

第二，关于这些唐人集子的刊刻时地问题。黄丕烈对于这些书的刊刻时地，一则曰“南宋初刻”（宋本《孟浩然集》跋），一则曰“北宋蜀本”（北宋本《孟东野诗集》跋）、“或云是蜀本”（宋刻本《孟东野文集》跋）、“相传残宋刊是蜀本”（汲古阁抄本《姚少监诗集》跋），前后矛盾，殊无定见。

现在先谈这个残宋本的收藏过程。

这部宋刻《刘梦得文集》曾经是封建时代的官府藏书，有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印记为证。对于这个印记，有两种说法：周锡瓚认为是“元官印”（残宋本《姚少监文集》跋），瞿中溶（木夫）也有同样的看法（《百宋一廛赋注》）。而《瞿目》则认为是“明时钤记”。周锡瓚是黄丕烈的前辈（见《藏书纪事诗》卷五、《黄芑圃先生年谱》卷上嘉庆元年），黄氏推之为“识古书为吾侨巨擘”（《芑圃藏书题识》卷二宋咸平刊本《吴志》跋）。瞿中溶是著名史学家钱大昕的女婿（有《瞿木夫先生自订年谱》，又见《清史稿》卷四九一《文苑传》）。他们的论断是可靠的。据《元史》卷八十七《百官志》三，翰林兼国史院，至元元年（一二六四年）始置，属官有典籍二员，所以有藏书，而且藏书上盖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印记。至于明代，只是在朱元璋还未正式称帝的吴元年（一三六七年，实际上是元至正二十七年）五月，沿元制置翰林国史院。洪武元年（一三六八年）正式称帝，建立明朝，即改这个官署为翰林院（《明会要》卷三十五），所以《明史》卷七十二《职官志》二已但标翰林院，而无翰林国史院之称。根据官制变化的历史事实，这个印记不可能是明代盖上的。《瞿目》的编者改变周锡瓚、瞿中溶的说法，是错误的。

这些官书，怎么成为残缺之本，又于何时为陆西屏所有，已无法考查。“陆西屏善识古，书籍而外，尤多古物”。黄丕烈曾经买到他家收藏刻有“墨林山堂”字样的大理石画桌（《黄颀遗书》本《芑圃藏书题识续录》卷三宋刻残本《姚少监文集》跋）。“西屏故后，书籍散亡”，黄丕烈曾托他的族侄陆树屏访求二刘集以外的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，已不可得。那时是丙辰（一七九六年）十月（校宋本《姚少监集》跋），陆西屏之死当在这以前数年。

黄氏所收藏的这个残宋本，后来归于陈揆，其时间在一八一八年以后。残宋本《姚少监文集》跋云：“年来生计日拙，力不足副书，所藏珍秘，大半散失。二孟集之一全一缺，同此翰林国史院官书，已归他所。今所存惟此原出西屏家之三种矣。”这个跋是戊寅（一八一八年）元旦写的，所谓“原出西屏家之三种”，即指《姚少监集》和二刘集（《刘文房集》、《刘梦得集》），当时此三书尚在黄氏家。两年以后，他写的校宋明抄本《李卫公文集》跋云：“庚辰（一八二〇年）秋，残宋本《会昌一品集》，钱唐友人何梦华介以归常熟陈子准所藏。”此书归陈，大约就是这时候。

陈揆也是清代常熟有名的藏书家（见《藏书纪事诗》卷六），他得到这个残宋本，虽然盖上了“稽瑞楼”印记，也编入了《稽瑞楼书目》，但书在他家只存留过很短的时间。顾千里丁亥（一八二七年）七月写《张月霄书目序》便称：“子准天无子，半生心

血所收，徒供族人一卖。”（《思适斋集》卷十二）这时距此书入稽瑞楼，不过六、七年。

陈揆死后，他的同乡翁心存（翁同和的父亲），访求他的遗书，“收其藏本，仅得三四”，《稽瑞楼书目》即是潘祖荫从翁家借得所收稿本刊行的（《稽瑞楼书目序》）。陈揆的另一个同乡瞿绍基“遴其宋元善本为世珍者，拔十之五，增置插架”（黄廷鉴《恬裕斋藏书记》，见《藏书纪事诗》卷六）。这个残宋本就进入了瞿氏铁琴铜剑楼。《瞿目》卷三著录元刊本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诗义》，云：“旧为邑人陈子准所藏。子准名揆，藏书甚富，著有《琴川志注》、《琴川续志》、《虞邑遗文》，其稿并藏余家。”可见陈氏遗书为瞿氏所得者不少，黄氏所称“原出西屏家之三种”，皆经由陈氏转入瞿氏，著录于《瞿目》卷十九。这个残宋本的卷首，除有“铁琴铜剑楼”印记外，还有“绍基秘笈”印记，可见它是瞿氏藏书较早的一批。瞿家收藏了一百多年，解放以后，此书才入北京图书馆。人民财富，终于归还了人民。

其次，谈一谈这个本子的刊刻时地问题。

黄丕烈把类此的几部唐人集子说成是“北宋蜀本”，显然错误；又说它们是“南宋初刻”，也不甚准确。黄氏所谈到的其他几部唐人集子情况，尚待考查；若就这个残宋本《刘梦得文集》而论，它避宋讳并不十分严格，“玄”、“朗”、“敬”、“恒”等字，或缺笔或缺笔。高宗之名“构”字，考宗之名“慎”字，也不都缺笔。惟避光宗之讳，十分谨严。卷三《史公神道碑》：“诏书敦促”的“敦”字，卷二《令狐氏先庙碑》：“仕拓拔魏为燉煌太守”的“燉”字，都缺末笔。其为南宋光宗时刊本，灼然无疑。光宗绍熙，只有五年（一一九〇——一一九四年），这个本子就是这五年间刻成的。它的刊刻时间已后于蜀大字本（即“董影”底本）及董刻浙本（即“徐影”底本）五十余年，后于陆游重刻浙本也有五至八年，是今存三个宋本中最晚的一个。

黄丕烈认为类此的一批唐人集子是“蜀本”，可能是根据陈振孙说“蜀刻唐六十家集多异于他处本”（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六）而推想的。但是，顾千里写《王摩诘集跋》（《思适斋集》卷十五）曾断定汪氏艺芸书舍所藏宋本《王摩诘集》为“蜀刻唐六十家集”之一，而且说：“直斋所称‘蜀本六十家集’，世无完书。大兴朱氏椒花吟舫有如干家，《权载之》五十卷，嘉庆某年刊行。《张说之》三十卷，江都汪孟慈为予写其副。其余闻有《王子安》等，而未审。他则《李太白》三十卷，康熙中缪氏刊之；《骆宾王》十卷，曾在小读书堆，后刊于扬州。二书真本，俱归艺芸。”这当中提到的《骆宾王文集》，黄丕烈和顾千里都写有跋文（见《菴园藏书题识》卷七；顾跋又见《思适斋书跋》卷四），他们把这个本子定为北宋刊本。所谓“刊于扬州”，即指秦恩复翻印。顾氏定这些书为“蜀刻唐六十家集”，则“蜀刻唐六十家集”与这批盖有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印记的唐人集子全不相干，不能定这一批书为“蜀本”。黄丕烈又举了它们是“蜀本”的一个理由：他收得汲古阁毛子晋旧藏的《姚少监诗集》抄本，毛氏说：“此浙本也。川本编次稍异。”黄氏取残宋本与毛抄相校，果然不同。因此断定：“盖相传残宋刊是蜀本，当即子晋所云川本，而与此之川（当是“浙”字误）本异者，宜其说之合也。”（汲古阁抄本《姚少监诗集》跋）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。第一，毛氏

说抄本系浙本，与川本不同，本讲得含混，什么时代、什么样子的浙本、川本，没有说清楚。第二，与浙本不同的，难道除川本以外就没有别的本子了吗？残宋本《刘梦得文集》与浙本《刘宾客文集》（即“徐影”）书名不同，但它与蜀本《刘梦得文集》（即“董影”）编次又异，可见与浙本不同的仍可能与蜀本也不同，浙蜀以外，别的地区说不定还有异本。把这一批书断为“蜀本”，理由是不具备的。

这一批书形式基本相同，又同为元代翰林国史院官书，认为它们同出于一个地区刊印，那样判断是比较可靠的。但不一定是蜀本。从这四卷《刘得梦文集》看，它的简体字特别多，如“尽”、“变”、“粮”、“继”等字多是简体，显然是一个书坊刻本。书的中缝，不记刻工姓名；书名卷数，简称为“得一”、“得二”等；这些特征，与我们最习见，而且也差不多刻于同时的万卷堂本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之类，颇有相似之处，因此疑它是建安（即建宁府，治今福建建瓯县）刻本。这个推测，虽仍乏确证，但有“董影”、“徐影”与相比较，已看出它不是蜀本、浙本，而建本的可能性则是颇大的了。

以下谈一谈这个残宋本在校勘上的价值。

顾千里写《百宋一廛赋》，提到这个残宋本，说：“宾客碑文，受教名儒。以石攻错，乍彰其瑜。”黄丕烈注说：“曩者钱少詹大昕借明刻完本刘集于予，手校《袁州萍乡县杨歧山故广禅师碑文》，疏于别纸云：‘石刻与刻本不同者二十余字，多五十字。’今宋本虽未能尽尔，然与明刻异者，必与石刻同。”

顾千里、黄丕烈的这些话，是“佞宋”之辞，具有偏见，事实并非如此。钱大昕对于这篇碑文，有详细的评论（见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》卷八），说：“碑文之末，有‘时宜春得良守齐口（似是君字），理行第一，雅有护持之功，化被于邑之庶寮，及里之右族，咸能回向，如邦君之志。故偕具爵里名字，列于其阴。’凡五十字，集本无之，当是梦得编定文集时删去之耳。”这五十个字，刘集的各种刊本都没有，那属于作者自己删改的问题，不在石刻与各种刊本计较优劣范围之内。今用碑文（碑文据《金石萃编》卷一〇五所载）与明刻和三个宋本相校，除这五十字外，不同的有二十多处，与钱氏所说合。这些不同之处仍有属于收入集子时刘禹锡自己改动的，如碑文：“亦犹水火异气，其成味也同德；轮辕异象，其致远也同功。”刘集各本皆无两“其”字。碑文：“镜业以销冤”，刘集各本“镜”皆作“证”。碑文：“扣至斯应”，刘集各本“至”皆作“之”。碑文：“传信亿劫”，刘集各本“亿”皆作“百”。碑文：“一室寥寥”，刘集各本“寥寥”皆作“寥寥”。这些地方，显然是碑和集各有由来，不能说谁是谁非。此外，有碑文不误而刘集各本皆误者，如“菏泽会公”，刘集各本“荷”字皆误作“荷”。“像闕灵塔”，刘集各本“灵”字皆误作“虚”。也有碑文误而刘集各本不误者，如“佛衣始传”，碑文“衣”误作“以”。“故能常定”，碑文“常定”误作“尝宗”。这些例子说明碑文与刘集各本互有优劣，“以石攻错”的提法，是片面的。钱氏认为“不同者二十余字，皆当以石本为正。”讲得不对。残宋本与明刻异、与石刻同的，只有一处：“随其去来，皆得利益”的“随”字，明刻本误作“堕”（朱本同），残宋本作“随”不误，与碑文合。但是这个字，“董影”、“徐影”皆作“随”，并非残宋本独特之处。有些异同，比较错综复杂。如“肖圆方之形，故寂灭以示尽；入菩提之位，

故殊相以现灵。”这一句的“肖”字，碑文作“宵”，乃是通假字（“宵”“肖”两字刘集各本错出的地方很多，如《问大钧赋》：“播形肖貌”，“徐影”、残宋本“肖”皆作“宵”；《何卜赋》：“胡形象之有肖”，“董影”“肖”作“宵”；《谪九年赋》：“又安用乎肖天地之形为”，“徐影”“肖”作“宵”）；但残宋本却作“笑”，既不同于各本，也不同于碑文，显然是一个误字。“现灵”二字，碑文作“地灵”，“地”乃误字。“董影”及残宋本作“现虚”，“虚”又是一个误字。又如“等空无碍”一句，碑文及“徐影”、明刻皆误作“等空无得”，而“董影”及残宋本不误。这些地方，残宋本与碑文及刘集诸本，或同或异，情况并不一致。还有碑文与刘集各本都不误，惟独残宋本讹误者，如“名自外得”，“外”误作“分”；“服勤闻法之上首”，“上”误作“士”；“生三十而受具”，“十”误作“千”：这些地方，说明残宋本并非佳刻。至于钱氏所特别提到的一处：“乘广弟子甄叔，亦有塔[’]铭，今集本‘叔’作‘升’，误之甚矣。”今刘集各本皆然，残宋本的‘升’字右下角多一点，但仍不能认为这是“叔”字（唯《文苑英华》卷八六七载此文作“叔”）。顾千里标榜为“乍彰其瑜”，显然吹捧过火。黄丕烈肯定地说：“与明刻异者必与石刻同。”那是没有认真比较的浮夸之谈。

残宋本是一个建安坊刻本，校刊草率，脱误甚多，再举一些较为显著的例子，如：

卷二《令狐氏先庙碑》：“惟太保府君志为君子儒”，脱去“志为君”三字。

又《高陵令刘君遗爱碑》：“明年八月庚午”，脱去“八月”二字。

卷三目录，脱去“王公神道碑”一行

又《王公神道碑》：“遂力学厚自淬琢”，脱去“力学厚自淬琢”六字。“兼侍河中尹”，脱去“河中”二字。

卷四目录，脱去“佛衣铭”一行。

又《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》：“三月甲子新塔成”，脱去“塔”字。“声香之蕴，如见如闻”，脱去“之蕴”二字及下一“如”字。

其他一二字的脱误，例不胜数。《令狐氏先庙碑》：“德充齿耄”的“耄”字，竟误为“老至”两字；《薛公神道碑》（在卷三）的“舟楫”二字，合而为一，竟不成字。以现存三个宋本相比较，毫无疑问，残宋本是刊刻最迟、错误最多的一个本子。

但是，残宋本仍有它值得注意之处。这个本子现存的四卷，计有赋九篇（在第一卷）、碑文十七篇（在第二至四卷），除《何卜赋》、《秋声赋》两篇外，其余赋七篇及碑文全部，都载入了《文苑英华》。《英华》校语中所引的“集”，往往与此本合。例如《薛公神道碑》，《英华》卷九一七载此文，“俄然欲翔”一句的“俄”字下校语云：“集作秋。”今案这个“俄”字，“董影”作“啾”，“徐影”作“欸”，而残宋本此字正好作“秋”。又如《许州文宣王新庙碑》（卷三），《英华》卷八四六载此文，“钦容拱手”一句的“钦容”二字下校语云：“集作相对。”今案这两个字，“董影”、“徐影”都作“欽容”，而残宋本正好作“相对”。根据这些例证，可以推断彭叔夏校刊《文苑英华》引用刘集，一般便是采取这个本子，所以“蜀本”、“浙本”，特须标出（详本刊上期拙文）。彭叔夏校刊《文苑英华》在宋宁宗嘉泰元年至四年（一二〇一

——一二〇四年；见周必大序），这时距这本子的刊印，不到十年。它是坊刻，书最易得，所以为彭叔夏所采用。蜀浙两刻，当时已不甚普遍，故偶尔标其异同。过去以《文苑英华》校刘集，发见它的校语引“集”，往往与蜀、浙两刻都不相同，殊为困惑。这次比对残宋本，大体解决了这一问题。残宋本虽只存四卷，但《英华》校语引刘集出于此四卷外而又与蜀、浙两刻不同者，还可以提供对于这一残本钩沉辑佚的资料。这个本子，对于研究刘禹锡诗文，仍是较有价值，应该注意的重要版本。

（上接86页）

酬寇侍御

南瞻按百越，黄帽待君偏。

仇注：黄帽指舟人。顾氏以黄帽为公自称。公在湖南，急于北归，岂能久留以待其再来？浦注：南瞻以待，冀其重逢。下一“偏”字，有侵侵乎不得再过之恐。

按：《隋书·礼仪志》“年七十以上赐鸠杖黄帽。”可见黄帽是老年人戴的帽子。南瞻是说杜公南瞻，那么，黄帽也是杜公自称无疑。“黄帽待君偏”的“偏”字，是形容等待寇侍御的时间之长，和心里迫切，故黄帽也因待君而偏了。俗话说，你等嘛，看把脑壳望偏。偏是有所本的。《汉书·外戚李夫人传》“上思念李夫人不已，为作诗曰：‘是耶非耶，立而望之偏，何姗姗其来迟！’”《彦周诗话》引“偏”连上一句，并谓退之（韩愈）“走马来看立不正”，即本其意。其实工部在退之前，早就用了这个偏字。浦注臆说无据。

风疾舟中书怀

畏人千里井，问俗九州箴。

仇注：畏人，问俗，言到处可忧。

按：这两句都是歇后语。千里井歇“泻剝”。畏人泻剝，是说怕坏人害人。《金陵记》引谚云：“千里井，不泻剝。”旧有人以剝马草泻井中，谓无再过之期。后汲水自饮，剝刺喉而死。故后人戒曰：“千里井，不泻剝。”工部就是害怕有人要泻剝，所以说“畏人千里井”。九州箴歇“阙”（同缺）。问俗则缺，是比喻风俗不良。《左传·襄公四年》“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，命百官箴王阙。”扬雄因作十二州箴。这里诗中限于字数，所以作九州箴。箴是用来砭阙（规戒缺点）的。言“箴”就知道有“缺”。

“问俗九州箴”，就是“问俗多缺”。杜公还在其他诗中说：“异俗吁可怪，斯人难并居。”又说：“俗薄防人面”。可见，杜公是时时处处不满他所生活的社会现实的。这里，他无可奈何地用两句歇后语来抒发自己对社会风俗恶劣的忧虑之情，客观上起到了揭露、鞭笞黑暗社会制度的作用。而他自己虽欲改变，则力不胜任，故下文说“葛洪尸定解，许靖力难任”——身将死，力不胜，只有隐忍吞声而已。